

#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

楊樹人

## 史料文件尚待整理

中央研究院，自孕育而成，自發展而播遷，乃至最後在台灣復建，都與朱家驊先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他對於這個全國最高學術機構，不但熱心愛護，而且長期擔任總幹事與院長，盡瘁服務，先後二十餘年。其中經過如欲詳細寫出，則非撰述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不可。鄙人與朱先生的過從，可說是到台以後之事，而且在他主持之下為研究院服務，為期短暫，甚多細情難於詳悉。只以本刊主編以本題殷殷相囑，勉為撰此短篇應命。

朱先生生前曾親自口授備忘錄一冊，迄今尚在朱府家屬密封保存之中；另有其大批私人文件，交研究院近代史所保存利用，二十餘年以來，聞仍在分類登記之中，結果如何，則不知其詳。民國五十二年逝世後，其門人故舊曾編印紀念冊，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所四十年紀念冊，其中均有駱先生與中央研究院的史實。此外朱先生的一位傑出的高足與長友李崇年先生，曾在《中外雜誌》第十九卷第二期撰「追懷朱駱先老師」專文，鄙人亦在大陸雜誌第十六卷第七期（四十七年四月十五日）寫過「中央研究院最近的十年」，又在五十二年冬發表過一篇懷念駱公的短文。可是此刻這些都不在手邊，全憑記憶，追錄所

知較深者於後，如有未盡準確之處，尚希賢達指正疵誤。

## 宏識遠猷奠定基礎

遠在蔡子民先生擬議創設中央研究院之初，朱先生便奉命擬定方案與制度，參加籌備；並且早在此以前，他便先已建立了初步基礎。十五年在廣東中山大學副校長任內，協助校長戴傳賢改組學校，擴充規模時，即從德國聘請傅斯年先生出任史學系主任兼文史研究所所長，稍後這個研究所擴充為語言歷史研究所。當中央研究院成立，傅氏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即以其原來中山大學的舊所為依據而加以擴充的。由於蔡、朱兩先生均曾在德國研究，研究院的制度，在很多方面參考普魯士研究院的組織。中央研究院的對外洋文名稱，不採英、德、法文而用拉丁文“Academia Sinica”，即是朱先生的建議。

中央研究院之名稱最先冠有國立二字，但在編制上則採學術獨立原則，不屬於政府部門。尤其「院長」之產生係由評議會選舉候補三人，請國府主席（現為總統）圈定任命，其餘全院人員均由院長聘任，不設任何其他「官員」，更分外加強了這學術獨立的精神。據考，當年這個制度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時，頗有不同的議論，由於戴傳賢先生信任朱駱公，全力支持，始獲通過，

這是朱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最原始，最有價值的貢獻。

研究院在十七年正式成立，其附屬各單位，先後集中南京鷓鴣寺山麓。朱先生自始即為評議員之一，他在中樞供職期間，一向以全力協助其各研究單位的發展；及至他在交通部長任內，與英國議妥歸還庚子賠款，成立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，出任主席，更大量撥付退款，補助研究院的研究設備及研究計畫，使其有很快的進步。

中日戰爭爆發以後，研究院向後方撤退，所有運輸經費與交通工具，亦都係朱先生以他個人的力量，多方設法維護。

## 十八年中兩度流徙

在抗日期間，研究院總辦事處雖設在陪都重慶，而各個研究所則分散在後方各地，經費窘絀，同仁生活維艱；蔡院長子民又因病滯留香港，幸而朱先生再度出任教育部長，儘力維持，使各所研究工作免於中輟。後來更因史語所所長兼總幹事傅斯年關於國事，秉春秋大義，直言無隱，開罪於行政院長孔祥熙氏，乃至預算經費亦成問題，全院同仁有斷炊之虞。公推朱家驊兼任總幹事，代行蔡院長事務，才能勉強渡過危機。

及至蔡院長病逝香港，評議會公選候補三人，朱先生為三人之一。唯以其時身任教育部長，

中央倚界正深，而朱先生謙辭院長候補，又以衆望所歸而無結果。最後由主席任命以代理院長名義，兼攝院務，此後繼續主持院務，凡十有八年之久。

倭寇投降以後，研究院各單位遷回首都，以及繼續發展等等煩瑣事端，又賴朱先生領導籌畫、實施與推進。各所設備圖書安返南京，完整無損。原有鷄鳴寺舊址不敷應用，另在九華山關地，增建數理化研究中心，進行現代物理原子研究，分設在上海的一部分自然科學研究單位亦大爲擴充。

卅七年辦理第一次院士選舉，數理、生物及人文三組，共得院士八十一人；復由院士推選評議卅二人，報請總統聘任。至此研究院的法定體制，全部完成。不幸，隨後共產黨稱兵作亂，大局垂危，中樞南移，研究院又不得不再度播遷。



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博士早年的照相。

這次疏散的情勢比對倭戰爭時，尤加爲難。

朱先生與各所首長商酌，原定先向上海集中，然後分向東南西南後方撤退，各別與廣州中山大學、梧州廣西大學及台北台灣大學合作，進行研究，並已獲各校表示歡迎。無如共黨地下工作分子遂行滲透，游說與威脅兼施，竟致引起一部分同仁猶疑觀望心理，踟躕不前。經過朱先生一再勸說，雖說大部分到達上海，但已缺乏勇氣與決心繼續前進，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數學所的設備完整到達台灣，其餘仍然滯留京滬，終於淪陷。三十八年二月中朱先生率領總辦事處同仁南遷廣州，另有少數地質研究所人員前往廣西，與廣西大學合作。其後又有一部分同仁由廣州遷往重慶，最後再撤退到台灣，到此中央研究院大部分淪陷大陸。當時情況紊亂，各機構皆然，研究院亦難獨善其身，朱先生殆已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### 毅然決定南港購地

先是朱先生已於卅七年以教育部長的資格，任命傅斯年先生爲台灣大學校長，一面整頓校務，一面爲大陸各校學者預留地步，一面亦兼爲研究院撤退台灣稍作準備。史語所和數學所到台以後，曾獲台大一部分的維持，但是大部分的設備與人員則暫留楊梅車站的破舊倉庫之中，湫隘難安，甚至不蔽風雨。又以中樞與地方脫節，預算經費亦無着落，朱院長不但要維持同仁生活，而且更要加緊設法恢復學術研究，勿令中輟，其時環境之惡劣，則爲研究院從來所未有。

在三十八年夏季，傅斯年先生曾與朱院長有長函往返討論院事，情辭懇切梗直，甚至辦結束，做最後遣散的問題都談到，可見當時的情形，的確十分艱困，然而朱先生並不灰心，依舊以萬分的忍耐，圖謀復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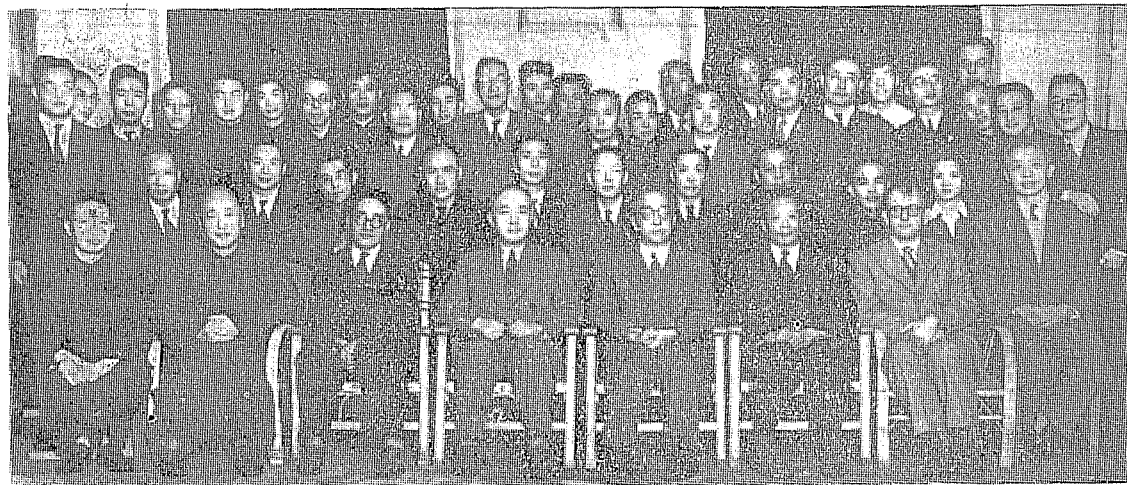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九年初，中央研究院才在行政院院長的預算上重行列名，每月經常費及臨時費雖然很少，但總算保存了這個單位的地位，以後纔有陸續調整與增加的資格。

接着便進行察勘地址、籌建房屋，因爲預算經費的遷延，四十二年十月才獲得的款，在南港現址動工，當時國家財政困難，不暇注意學術研究，全恃朱先生個人聲望向主管接洽，幾乎是到了舌敝唇焦的程度。加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與美國洛氏基金會的部分補助，暫先完成了倉庫一座，研究室樓房一座，小會議室一座，宿舍七幢。

史語所與數學所先行恢復工作，接踵恢復植物研究所與台灣糖業公司合作，培植甘蔗新品種，另行籌設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。

四十四年得到中英文教基金會撥出最後餘款美金二十萬元，朱先生原擬動用此款，補助植物研究所的擴充，以及動物、化學及經濟研究所的籌設，但經行政院呈報總統府以後，接奉指示全部用於籌設化學所，乃遵照辦理。其他各所所需經費，另行籌畫。

鑒於化學所購買設備與建築房屋需要時日，經費一時不能全部動支，而全院發展需要土地，毗鄰地價不斷上漲，迫不及待，朱先生毅然決斷



中央研究院遷台初期朱家驊院長與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合影，前排右起芮逸夫、董作賓、第四胡適、第五朱家驊、第六周鴻經、第七李濟。

，先行借用化學所的補助一部分，購買土地十餘甲。全部手續均會報告當局，並經國家行局結匯，但竟成日後流言中傷之因。其實，今日研究院已嫌土地不敷應用，足徵當年朱先生的遠見了。所惜者，由於經費不充，從前所未能購進的附近土地，已為企業界購去，而無法取得以為擴充之用了。

### 獨力維護竟遭謠諑

到此為止，幾乎是朱先生一人獨力維護研究院的延續與發展，依照法定的體制，必須恢復院士會議與評議會，研究院的生存才能入於正軌，這在當時，頗有技術上的困難。由於朱先生的果斷與決心，經過一年的努力籌畫，破除阻礙，終於四十六年四月初在台灣舉行了中斷多年的院士會議與評議會，並決定繼續辦理院士選舉。

就在那年的夏天，由於種種捕風捉影的謠言和不符合事實的誤會，使朱先生灰心，不得不呈請辭職。在真相大白、辭職獲准以後，評議會選舉候補人選，胡適之先生奉令長院，朱先生於是年年底卸職。

彼時，已如前文所說，研究院最高權力機關，院士會議與評議會已恢復正常職能，全院有新舊研究所（包括籌備處在內）七所，土地三百六十畝，研究用樓屋五座，宿舍三十餘幢。同時，中央研究院代表中華民國全體學術界為全世界最高科學團體：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（International Council of

Scientific Unions: ICSU) 的會員，大陸淪陷後，關係中斷數年，亦於四十五年排除阻礙，補繳會費，恢復會籍，使我國學術界重躋於國際學術之林，免為中共所乘，亦係朱先生領導之成果。四十六年院士會議建議國家擬訂長期發展科學計畫，後來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以及現在的國家科學委員會，都是由是而成立。

### 胡適正論飲水思源

所以，在胡適之先生接長研究院以後，有某院士經常批評朱院長的過去行政，一次胡先生不耐，曾嚴肅的說過這樣的話：「○○○，我胡適之第一次回台時，南港這兒還是一片稻田，今日有此局面，我是坐享其成啊！在我個人，只有敬佩駱先！」

在胡適先生去世以後，評議會曾於五十一年再推選朱家驊先生為候補之一，亦可見評議會同人對於朱先生的尊敬與推崇。他對於研究院培植、愛護、服務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任勞任怨任謗，其貢獻誠不可磨滅。當年，如非朱先生襄助蔡子民策畫，可能今日研究院的體制不同；又如大陸淪陷後，沒有朱先生的努力，或者研究院早已夭折。誠然，在他逝世十三年以來，研究院不斷發展，尤其近年有穩定而持續的進步。朱先生九泉之下，得知有此成就，亦當含笑。飲水思源，如何維護原有的精神與目的，不負前人心血，則將全恃研究院同人的勇毅決心，與國家的寬宏照拂，這也是大家所鑒香禱祝的。

六十五年六月廿九日